

李福標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中山大學學術叢書

皮陸年譜

李福標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 廣州 ·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皮陸年譜 / 李福標著. —廣州: 中山大學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306-03807-4

I. 皮… II. 李… III. ①皮日休 (約 834~883) 一年譜
②陸龜蒙 (?~881) 一年譜 ③皮日休 (約 834~883) 一唐詩—
文學研究 ④陸龜蒙 (?~881) 一唐詩—文學研究 IV. ①K825.6
②I207.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241397 號

出 版 人: 祁 軍

策 劃 編 輯: 章 偉

責 任 編 輯: 章 偉

封 面 設 計: 林 綿 華

責 任 校 對: 劉 麗 麗

責 任 技 編: 何 雅 濤

出 版 發 行: 中 山 大 學 出 版 社

電 話: 編輯部 020-84111996, 84113349

發行部 020-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廣州市新港西路 135 號

郵 編: 510275 傳 真: 020-84036565

網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廣州中大印刷廠有限公司

規 格: 880mm × 1230mm 1/32 12.125 印張 350 千字

版次印次: 2011 年 2 月第 1 版 201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價: 39.00 圓

如發現本書因印裝質量影響閱讀,請與出版社發行部聯繫調換

目 錄

前言	(1)
凡例	(33)
卷一 皮陸籍貫與家世	(35)
卷二 唐文宗大和四年至唐懿宗咸通三年	(57)
卷三 唐懿宗咸通四年至唐懿宗咸通九年	(127)
卷四 唐懿宗咸通十年至唐懿宗咸通十二年	(186)
卷五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至唐昭宗天復二年	(284)
主要參考書目	(376)
後記	(381)

前 言

皮陸，是晚唐著名作家皮日休、陸龜蒙二人的合稱。皮日休，竟陵（今湖北天門市）人，咸通八年進士，傳云乾符年間參加黃巢起義軍，後或為巢所殺，或為唐廷所誅，或亡命江南，不知所終。陸龜蒙，吳郡（今江蘇蘇州市）人，以白衣隱士而終身。出生地千里相隔，結局之大異也令人咋舌。這二人的生平經歷及其文學創作活動狀況如何，又以甚麼因緣而齊名合稱呢？這是《皮陸年譜》所要著力探索的主要問題。下面就一些相關的問題做點說明。

一

胡震亨在考察唐代文人合稱現象時說：“唐人一時齊名者，如富、吳（嘉謨、少微），蘇、李（前味道、嶠，後頔、父），燕、許（燕國公張說、小許公蘇頔），蕭、李（穎士、華），韓、柳（愈、宗元），四傑（王、楊、盧、駱），四友（杜審言、李嶠、崔融、蘇味道，稱文章四友），三俊（元稹、李德裕、李紳），皆兼以文筆為稱。其專以詩稱有沈、宋（佺期、之問），錢、郎（起、士元。時人語‘前有沈、宋，後有錢、郎’，是也），又錢、郎、劉、李（合劉長卿、李嘉佑稱之，亦時人語），鮑、謝（防、良輔），元、白（稹、居易），劉、白（合劉禹錫

稱)，溫、李（庭筠、商隱），賈、喻（島、晁。出顧雲文），皮、陸（日休、龜蒙），吳中四士（賀知章、劉昫虛、包融、張旭。一云無昫虛，有張若虛），廬山四友（楊衡、符載、崔羣、宋濟），三舍人（王涯、令狐楚、張仲素），大曆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李端），咸通十哲等目（許棠、張喬、喻坦之、劇燕、任濤、吳罕、張蠙、周繇、鄭谷、李棲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實十二人）。至李、杜，王、孟，高、岑，韋、孟，王、韋，韋、柳諸合稱，則出自後人，非當日所定（按，楊憑有詩云：‘直用天才眾卻嗔，應欺李杜久為塵。’憑，大曆中人也。知兩公身沒未幾，世已有並稱矣，但至韓公始大定耳。王、孟以下諸合稱，則宋人論詩所定也。）”（見《唐音癸籤》卷二八）據胡氏所論，文人合稱分兩種情況：作家被時論合稱，在同時代人中流播美譽，此所謂“齊名”；後世的文學批評者使用特有的審美尺碼，將前輩作家聯繫在一起，此所謂“並稱”。“皮陸”之稱屬於“齊名”一類。

晚唐文人合稱現象以“齊名”者居大多數。當然，被後世“並稱”者似乎亦不少。據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三統計，唐人父子並稱的有四十八組，其中竟有十七組屬於晚唐，可知此期文人並稱現象之盛。當然，在被後世“並稱”的文人中，恐怕不能說在當時就沒有被時論所注意而“齊名”的。因為胡震亨與胡應麟立論的角度不同，《詩藪》所說的“並稱”現象，絕大部分應該被納入《唐音癸籤》所謂的“齊名”範疇。更有文人在當世“齊名”，然而并未有合稱者，當亦不在少數。晚唐文人齊名合稱現象之眾多，無疑與唐代科舉取士政策關係最為密切。科舉考試左右著士人的生活和社會風尚，而且對文學發展造成巨大的影響。這是人所共識。晚唐參加科舉的文人隊伍較之初盛唐規模更加巨大，科舉考試的競爭形勢亦日趨激烈。康駢《劇談錄》卷下

“元相國謁李賀”條云：“自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春官者千餘人。”自初唐以還，科舉考試即以詩賦較勝。《唐音癸籤》卷一八“唐進士初止試策”條注云：“唐試士重詩賦者，以策論惟剿舊文，帖經只抄義條，不若詩賦可以盡才。以世俗偷薄，上下交疑，此則按其聲病，可塞有司之責。雖知為文華少實，捨是亦汗漫無所守耳。說詳《選舉志》。今代重經義，亦此意也。”所謂“按其聲病”，即唐詩經沈、宋之後所定的對詩“律”的規定。所謂“律”，亦即法式、程式之意。唐代科舉制的以詩試士，就因為“律詩”、“律賦”等大致如明清的“八股”，有固定的模子，便於閱卷評估的操作。從主考和應試者雙方來說，都更依賴可以“盡才”且有“聲病”可按的詩賦。晚唐考生之多，閱卷之繁，考官則更圖省力，對詩、賦“律”的依賴更強烈。因此，考場之外的詩歌創作程式化進程因為科舉考試而加速，門法競技的創作趨勢隨之飆升。此時不僅個體詩人創作頗豐，許多行走在科舉之路上的詩人在交遊、競爭中三三五五結成團組，進行集體聯創的活動。文人團組現象之夥，只需翻一翻《唐詩紀事》、《唐才子傳》等文獻就可知。如《唐詩紀事》卷六三“劉駕”條載：“駕與曹鄴友善，工古風。鄴大中時擢第，不出京，候駕登科同去。”又同卷“王駕”條載：“駕，字大用，河中人。登大順進士第，仕至禮部員外郎。自稱守素先生，與圖、谷相為詩友。”討論切磋試藝（實際就是詩藝）自然是“詩友”們的中心話題。

同科舉考試相關聯者，晚唐隱居現象頗眾，山林江湖也成了文學團組的溫牀。徐松《登科記考》卷二三咸通十二年據《永樂大典》引《池州府志》云：“張喬字伯遷。時李頻以參軍主試，喬及許棠、張蠊、周繇皆華人，時號‘九華四俊’。”《唐詩紀事》卷六七“顧雲”條載：“雲，字垂象，池州饒賈之子也，風韻詳整。與杜荀鶴、殷文圭友善，同隸業九華。咸通中登第，為高駢淮南從事。”又同卷“李昭象”條載：“懿宗末年，以文干相

國路公巖……會巖貶，遂還秋浦，移居九華，與張喬、顧雲輩為方外友。”卷七一“沈彬”條載：“彬，唐末遊湖湘，隱雲陽山十年餘，與虛中、齊己、貫休以詩名相吹噓。又與韋莊、杜光庭唱和，皆蜀人也。”卷六三“司空圖”條引王禹偁《五代史闕文》云：“圖有先人舊業在中條山，極林泉之美，圖自禮部員外郎避地焉，日以詩酒自娛。屬天下板蕩，士人多往依之，互相推獎，由是聲名籍甚。”此類不勝枚舉。

科場的角逐很激烈，而考生中大批來自下層民間的寒士，他們滿懷熱望從各地奔向長安、洛陽兩都地區，而結果往往不能如意。《登科記考》卷二咸通元年“陳河”條引《冊府元龜》云：“時舉子尤盛，進士過千人。然中第者皆衣冠之子，惟陳河一人孤貧負藝，第於榜末。”一般士子很難上第，即使考中，也不一定即授官，往往要到地方使府中求發展。中晚唐以來的使府辟署，為文人團組的形成也提供了方便。而有些府主為某一目的大量搜羅文人，甚至不惜武力以致之。《唐詩紀事》卷六九“羅隱”條載：“隱與桐廬章魯封齊名，錢鏐初起，以魯封為表奏孔目官，不就，執之。後以隱為錢塘令，懼而受命……鏐自是厚禮之。”士人既由使主辟署入幕，便自稱出於使主之門。聚集一方的文士在相互酬唱、切磋之間，密切了關係，自然成了一個有相對明確的審美趣味的文人團組。

初盛唐人不喜歡被某一前輩作家束縛住，他們聲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馬行空，如陳子昂、李白。杜甫作為一個後進詩人苦苦追隨李白，但李白對杜甫“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春日憶李白》）的興趣顯然并不大。到中唐韓愈才力稱“李杜”，“常恨李杜二人不相從”（《送孟東野》）。《唐音癸籤》卷二五云：“詩道須前後輩相推引。李、杜兩大家，不曾成就得一個後輩來，殊可惜。惟昌黎公有文章官位聲名，任得此事。公又實以作人迪後擔子一身肩承，史稱其獎借後輩，稱薦公卿間，

寒暑不避。而會其時，所曲成其業與其身名如孟郊、李賀、賈島其人者，又皆間出吟手，能諧公翻鬥新異，換奪一世心眼傳後。以故繼諸人而起者，復燈燈相繼續不衰，追頌公亦因不衰。”而晚唐文人團組意識普遍而鮮明，他們對前輩詩人亦步亦趨，且學習的對象多局限於與自己關係很近的詩人。如《唐詩紀事》卷六六“趙牧”條載：“牧，不知何許人也。大中、咸通中，效李長吉為短歌，可謂蹙金結繡而無痕跡。”同書卷六八“唐彥謙”條載：“彥謙學義山為詩。”卷六九“羅隱”條載：“鄴王羅紹威學隱為詩，自號其文為《偷江東集》。”隨著詩歌創作隊伍的擴大，文人團組現象的加多，詩歌作品產量的劇增，詩歌品評也同步發展起來。在這樣的背景下，某作家與另一作家，甚至與一羣作家，因為某一共同的創作特色往往在創作活躍期就能被社會品議體系所注意和炒作，“齊名”之事在詩壇上屢見不鮮。皮日休、陸龜蒙因為某種特殊的因緣而被合稱“皮陸”，只是眾多文人合稱中的一個較著的現象而已。

二

據上引胡震亨所論，唐代文人或因文筆、或因詩賦齊名而合稱，而皮陸是以詩稱的。《唐音癸籤》卷二五又論及皮陸，特為點明道：“皮、陸以萍合唱和吳中，因而齊稱。”

文人唱和起源於文人酬贈。酬贈詩兩漢魏晉即已有一定規模，是友朋親愛之間的自然交流。而唱和詩是在正式或非正式的組織下進行的一種有一定目的、有一定連續性的文學或文化“活動”。六朝，特別是齊梁時期，是文人唱和詩的第一個高潮期，在君臣之間的應教、應令場合，或同僚之間應酬中多有之。這是

五言詩的黃金時節，它促成了五言律詩的定型。^① 初唐及盛唐初期，唱和詩風一般亦盛行在宮廷君臣及上層廷僚之間，多“奉和御制”。此時的唱和雖說是六朝唱和之風的餘緒，但它也負載著極為重大的詩體探索功能，即七律的定型與推廣。^② 安史亂前，地方性的文人集體唱和甚為少見。大曆後詩歌唱和方成為各階層，尤其是中下層地方文人干謁請託、交流感情、切磋詩藝的重要手段。著名的元白唱和，即是元稹、白居易二詩友互致情誼的唱和。隨著藩鎮幕府的興起，文士們南來北往的干謁遊幕，方鎮亦為了招引文士，往往以詩歌唱和活動來增加感情聯絡，幕府唱和因此十分火熱。^③ 晚唐科舉考試形勢的日趨緊張，士子們在應考的路途上奔波不暇，留給他們切磋詩藝的時間是少得可憐的，正如趙匡《舉選議》指斥科舉之弊云：“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糧未辦，即又及秋。正業不得修習，益令藝能淺薄。”（《全唐文》卷三五五）爲了更好地適應科舉考試，士子們渴望盡快地掌握法度，走捷徑，相互唱和無疑是一個行之有效的途徑。這比一個人悶頭苦苦摸索、獨立奮鬥要好得多。詩友之間在唱和中切磋詩藝、吹噓名聲，及時捕捉科舉考試新動向，把握審美新口味，追逐時尚的詩風。隨著文人團組現象的加多，唱和活動通過各種渠道，從宮廷流向幕府，再由各地幕府擴至民間，滲入社會各個階層，乃至於士子狎妓時酬唱之風亦頗盛。

而皮陸唱和卻是在“萍合”中產生。所謂“萍合”，約有三

① 吳承學、何志軍《詩可以群》（載《中國社會科學》2001年第5期）一文對此有細緻深入的論述，可參看。

② 參趙昌平《初唐七律的成熟及其風格溯源》，載《中華文史論叢》1986年第4輯。

③ 據戴偉華《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唐代幕府文人唱和活動較有影響的前後約有二十三次。

層意思。其一，咸通十年皮日休以一旅人身份進入蘇州崔璞幕府，一月以後，作為當地士人的陸龜蒙方來拜訪，二人一見如故，展開唱和。《松陵集序》云：“《太玄》曰：‘稽其門，辟其戶，眼其鍵，然後乃應。’況其不者乎？余遂以詞誘之，果覆之不移刻……凡一年。”從此看，皮陸唱和，皮乃發起人，皮陸二人共主其事。《松陵集序》云：“由是風雨晦冥，蓬蒿翳蒼，未嘗不以其應而為事，苟其詞之來，食則輟之而自飫，寢則聞之而必驚。”而之前二人從未謀面。其二，咸通十二年，陸龜蒙編定其唱和詩集《松陵集》，而皮日休離開蘇州，唱和終止。之後皮日休又來過蘇州，然與陸龜蒙似乎再未聚合。且二人在唱和前，特別是唱和后的經歷大異，思想也有大的差別。其三，皮陸唱和雙方的地位不太相同。此時，皮日休已是及第進士，遠來蘇州刺史軍事院為幕客；而陸龜蒙尚是一個當地秀才，正準備著將來的科舉考試。他們的唱和沒有一個明確的功利目的。皮陸唱和并非發生在親朋友愛的酬唱，更與宮廷達官、幕府同僚、一般文人團組等之間的唱和截然不同，故特為人所注意。

作為一種文學或文化活動，詩歌唱和不必強求情志的深層表達和個人風格的流露，而可以更多地傾注對體制形式的關懷。這樣，客觀上減損了創作中許多內在的障礙。皮陸唱和之初，詩作較少，這是因為皮日休才進入蘇州，與陸相交還不太深，之間有文化、心理等方面的距離，雙方還各自在顯示自己，處於“亮相”、“磨合”階段，沒有達到水乳交融的境地。況且，此前他們的詩歌創作並不是走同樣的一路。皮日休現存最早的詩歌是《皮子文藪》第十卷中的三十六首。這些詩是經過編排整理的，無疑能代表其風格。三十六首中有三十首是五言古詩，六首為今體律詩。而五言古詩又多是樂府體，著名的有《正樂府》十篇，序云：“樂府，蓋古聖王採天下之詩，欲以知國之利病，民之休戚者也。得之者，命司樂氏入之於埴簞，和之以管籥。詩之美也，

聞之足以觀乎功；詩之刺也，聞之足以戒乎政……故嘗有可悲可懼者，時宣之於詠歌，總十篇。故命曰‘正樂府詩’。”其作品面對現實，以素描式的筆觸真實展示了社會底層的哀號苦淚，以及對貪官污吏的怨怒。陸龜蒙早期詩歌傳存較少，可考定寫作時間者不多。其早年習詩大約專注於藝術形式的模擬與鍛造，並以此為樂。《甫里先生文集》卷一六《甫里先生傳》云：“少攻歌詩，欲與造物者爭柄，遇事則變化不一。”可見此前二人的詩風是有相當大的距離的。但盛行於民間幕府的唱和之風，使他們在突然相遇唱和時有相容相親的可能。皮日休在入吳前，每一次漫遊中的干謁幕府，應該有一些交際酬唱之作，有較為豐富的唱和經驗。其實隱居襄陽時，他對唱和之事就已躍躍欲試，可惜沒有機會參與溫庭筠、徐商、余知古等人的漢上唱和。《松陵集》卷一皮日休《魯望昨以五百言見贈，過有褒美，內揣庸陋，彌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敘相得之歡，亦迭和之微旨也》詩云：“明水在藁秸，大羹臨豆籩。將來示時人，猘猶垂饒涎。亦或尚華縟，亦曾為便嬾。亦能制灑灑，亦解攻翩翩。唯思逢陣敵，與彼爭後先。”其中“將來示時人”所提及的，大約指皮日休入吳前的作品。而陸龜蒙在此之前的唱和經歷就更多了，酬唱作品、酬唱經驗似比皮日休更為豐富。其父賓虞曾在浙東幕府掛職，而那裏是中唐以來一個著名的文人唱和根據地，乃父當有酬唱經驗相傳陸龜蒙。《送豆盧處士謁宗丞相序》敘及與豆盧瑑宣城之交遊酬唱，然其酬唱面目今不得睹，大約學小謝為詩。咸通六年至七年，陸龜蒙在陸州與刺史陸墉遊，亦有酬唱，不存。《松陵集序》云：“十年，大司諫清河公出牧于吳，皮日休為部從事。居一月，有進士陸龜蒙字魯望者，以其業見造，凡數編。”皮日休《奉酬秋賦有期有寄》詩云：“十載江南盡是閑，客兒詩句滿人間。”儘管是在誇譽對方，但皮陸未識之前，陸詩已有相當規模和名聲則是不容懷疑的。故吳中一相見，皮日休“以

詞誘之”，陸龜蒙“果覆之不移刻”。

咸通十一年春夏之後，皮陸的唱和進入飛躍的高產期。這是因為周圍的人事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松陵集序》云：“噫！古之士窮達必形于歌詠，苟欲見乎志，非文不能宣也，於是為其詞。詞之作固不能獨善，必須人以成之。”亦正如丹納在《藝術哲學》中所云：“周圍要有人同情，有近似的思想在外界時時刻刻幫助你，使你心中一些渺茫的觀念得到養料，受到鼓勵，能孵化、成熟、繁殖。”^①這首先與蘇州刺史、幕主崔璞的鼓勵及參與有關。尤其是他此時安排皮日休主持太湖禱雨活動，在松陵酬唱中的意義非同小可。皮日休在這次活動中有組詩《太湖詩》的創作，陸龜蒙繼有和作。其次，這次由當地政府部門組織的禱雨活動，帶有宗教文化色彩，^②大約有當地文化名流、道士、佛圖參謀其事。皮陸《太湖詩》的唱和在吳中民間，特別是進士圈中及道士、佛圖間，當有不小的影響。隨之，參與或關注皮陸唱和者不少。據《松陵集序》稱，張賁、李穀“善其所為，皆以詞致”。從參與皮陸唱和的人員身份看，有幕府長官（崔璞），有地方幕僚（李穀），有“道侶”（張賁），有前進士或進士（羊昭業、鄭璧、顏萱、司馬都），有隱士（魏璞），另身份未明者一人（穰嵩起）。以地域而論，崔璞是朝廷命官，張賁、李穀是旅客，“其餘則吳中名士。”（《松陵集序》）《松陵集》中除皮陸唱和之作外，現存其他參與唱和者崔璞詩二首，張賁詩十五首，李穀詩四首，羊振文詩一首，顏萱詩三首，鄭璧詩四首，司馬都詩二首，魏璞詩一首，總共三十二首。另，張賁參與皮陸聯句二首，穰嵩起參

①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 年版，頁 136—137。

② 唐代祈雨無論中央、州縣還是民間都有。它有時帶有強烈的政治意義，其中道教因素很活躍。參雷聞《祈雨與唐代社會研究》，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國學研究》第八卷，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年版。

與皮陸聯句一首，張賁參與皮陸問答十首。此數人中，以張賁對皮陸唱和的支持為最力。皮陸唱和剛開始時大約只是皮陸二人私自的活動，未公開，無影響，後來因為各路詩友的參入與支持，才更為火熱，才有名聲。質言之，最初皮陸的詩歌往還，充其量屬於“酬唱”的範疇，而後才質變為文人“唱和”。

從皮陸唱和的特點看來，其實他們二人本身就懷有一個“皮陸”齊名的夢想。他們對歷史和當今文學形勢有一個總體的把握，皮日休《魯望昨以五百言見贈，過有褒美，內揣庸陋，彌增愧悚。因成一千言，上述吾唐文物之盛，次敘相得之歡，亦迭和之微旨也》一詩，對從“三辰至精氣，生自蒼頡前。粵從有文字，精氣銖於綿”起，經漢初、建安、兩晉、陳隋，以至“吾唐革其弊，取士將科懸”這一段文化歷史的發展變化狀況作了簡明扼要的敘述，而對自盛唐至晚唐的這一部“當代文學史”更是非常推崇。詩云：“自開元至今，宗社紛如煙。爽若沆瀣英，高如昆侖顛。”又云：“其中有擬者，不絕當如綏。齊驅不讓策，並駕或爭駢。所以吾唐風，直將三代甄。”陸龜蒙的和詩對文學發展作一回顧和展望之後，頗有不滿者，云：“歸來蠹編上，得以含情窺。……誰蹇行地足？誰抽刺天髻？誰作河畔草？誰為洞中芝？誰若靈囿鹿？誰猶清廟犧？誰輕如舉毛？誰密如凝脂？誰比蜀嚴靜？誰方巴賁貲？誰能釣卞鰲？誰能灼神龜？誰皆如水火？誰同若埧簾？誰可作樛棟？誰敢驅谷蠹？用此常不快，無人動交鋒。空消病裏骨，枉白愁中髭。”從這些詩句中可見，皮陸唱和乃是要繼承并發揚文學史上前輩作家“齊驅”、“並駕”的精神，并創新異的文學樣式的。他們大量創作次韻詩，尤其是百韻酬唱次韻詩，遙接元和間“元白”唱和之聲勢，足以說明這一點。

將皮日休、陸龜蒙二人合稱為“皮陸”，這個提法的最早出現，有據可查的文獻是在錢易《南部新書》中。其丁卷云：“嚴惲，字子重，善為詩。與杜牧友善，皮陸常愛其篇什。”事實上

皮陸合稱應該有更早的出處。皮陸齊名之事，在唱和的當時就被社會的評議體系注意而承認了。據《全唐詩》卷六三一載張賁《和皮陸酒病偶作》、《偶約道流終乖文會答皮陸》等詩，其詩題已有“皮陸”齊名的意思。當然，《全唐詩》中的詩題可能是後人改定的，因為由陸龜蒙手訂、皮日休撰序的唱和詩集《松陵集》中還沒有出現皮陸合稱的明證，他們自己當然不可能在詩題或本詩中妄稱“皮陸”。但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松陵唱和的主角是皮日休、陸龜蒙二人，《松陵集》的前八卷都是皮陸二人的唱和詩歌。而第九卷中彙集了皮陸二人和其他詩友的唱和之作，大都是一對一的唱和，少有在原唱或和詩的詩題中提及贈與某幾人或和某幾人的情況，即使有，也不點明。如張賁有《旅泊吳門呈一二同志》（陸有和篇），陸龜蒙有《幽居有白菊一叢因而成詠呈一二知己》（張賁、皮日休、鄭璧、司馬都等有和篇）。雖然卷九李穀有《浙東罷府西歸，道經吳中，廣文博士、皮先輩、陸秀才皆以雅篇相送，不量荒詞，亦用酬別》一詩詩題中提及具體的三人，但僅此一例。《松陵集》的第十卷是雜體之作，其中聯句部分和問答體是張賁、陸龜蒙、皮日休三人聯創的。就算是詩題中沒有“皮陸”合稱的明證，但從參與唱和的詩友們創作的詩歌寓意裏，實在又明白無誤地體現了“皮陸”齊名之意。如張賁《以青粬飯分送襲美魯望，因成一絕》詩云：“應宜仙子胡麻拌，因送劉郎與阮郎。”以劉晨、阮肇齊名喻皮陸齊名。又張賁《偶約道流終乖文會答皮陸》詩有“應怪文星近客星”之句，《和皮陸酒病偶作》詩有“難繼二賢金玉唱”之句。從此可見皮日休、陸龜蒙齊名之事是從吳中唱和當事人中間，在他們酬唱活動發生的當時傳開的。詩友們在這場唱和中參與助興，樂於成人之美，那麼在唱和活動結束以後，《松陵集》的編纂及其在士大夫和江湖隱士中間的傳開，使他們更願意為皮陸的唱和風流吹噓張揚。“皮陸”之稱的出現可能在緊接《松陵集》編訂之後不久。《松

陵集》的編訂，是皮陸合稱的關鍵。那時，皮、陸二人的創作活動並未歇止，皮陸合稱屬齊名的性質，宜然。

中唐幕府或民間（元稹所謂“江湖間”）有對元和體狂熱的效仿活動，晚唐後儘管文人集團更多，唱和活動也更繁，但為甚麼再也沒有“開成體”、“咸通體”出現了呢？或者說，皮、陸或其他唱和現象沒有像元、白的唱和那樣引起一個時代的全國性的轟動效應呢？時移世遷，唐末唱和活動大都走向邊緣，分散成“小巧”私家唱和之格局。雖然再沒有元和體之氣象，但在某些方面比元和體有進步則是應該承認的。最起碼，他們對於唱和詩的觀念已經超出元、白一步；就唱和深度這一點來看，韓、孟不如元、白，元、白不如皮、陸。皮、陸的唱和更為和諧情洽。元、白當年對“江湖間”效仿他們的“小詩”而惹“司文者”的責難，很是耿耿於懷，而皮、陸則把唱和詩真正帶到“江湖間”。這次唱和與此前的宮廷唱和、幕府唱和大不同，以皮、陸二人為主，參與唱和者只偶一助興，可謂是一次私家唱和。以前的非組織行為的酬唱或者有組織的唱和活動，一般發生在友朋親愛之間，是一種自然的抒發；而後人們即使素不相識，卻可以通過唱和活動來建立友誼。

三

中晚唐文人手編文集之風頗盛，幾乎人人有集，有的還不止一集，尤喜編纂唱和文集。《唐音癸籤》卷三〇“集錄一”云：“又同人倡和有珠英學士集（武后時崔融集修三教珠英學士李嶠、張說等詩五卷）、大曆年浙東聯倡集（志不詳何人，疑鮑防、呂渭與嚴維諸人倡和詩也。二卷）、諸朝彥過顧況宅賦詩（一卷）、集賢院壁記詩（李吉甫、武元衡、常袞題詠集二卷）、壽陽倡詠集（裴均，十卷）、渚宮倡和集（前人，二十卷）、荊潭倡和集

(裴均、楊憑，一卷)、盛山倡和集(韋處厚與元稹等十人詩，十二題一卷)、斷金集(李逢吉、令狐楚倡酬，一卷)、三舍人集(王涯、令狐楚、張仲素五七言絕句，一卷)、三州倡和集(元稹、白居易、崔元亮，一卷)、元白繼和集(一卷)、汝洛集(劉禹錫、白居易倡和，一卷)、劉白倡和集(三卷)、洛中集(令狐楚、劉禹錫倡和，一卷)、彭陽倡和集(前人，三卷)、吳蜀集(劉禹錫、李德裕倡和，一卷)、漢上題襟集(段成式、溫庭筠、崔珣、余知古、韋蟾等襄陽幕府倡和詩什及書箋，十卷)、松陵集(皮日休在吳郡幕府與陸龜蒙酬倡詩，六百五十八首，十卷)、僧廣宣與令狐楚倡和詩(一卷)、僧靈澈酬倡詩(十卷)、峴山倡詠集(八卷，疑顏真卿與劉全白等倡和詩)、唐名賢倡和集(二十卷，宋志存四卷)、荆夔詠和集(一卷)、翰林歌辭(一卷。以上三編失撰人名)。”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三、雜編卷二所記略同，然多載《名公倡和集》二十二卷、《五僧詩》一卷、《僧中十哲集》一卷、《贈毛仙翁詩》一卷、《賀監歸鄉集》一卷、《白監東都詩》一卷。陸龜蒙和皮日休都熱衷於編輯文集。據文獻記載，皮日休除編有《皮子文藪》十卷之外，還有《鹿門家鈔》、《胥台集》等著述，陸龜蒙在與皮日休唱和之前，已編有《吳興實錄》、《稗說》、《小名錄》、《耒耜經》等。可惜有的已散軼，今不得睹。皮陸之齊名合稱，與其編纂的文集《皮子文藪》、《笠澤叢書》、《松陵集》的編纂有相當密切的關係，而以唱和詩集《松陵集》的編纂關係最大。

陸龜蒙在《甫里先生傳》等文中屢稱“少不攻文章”，有文亦不結集，為人隨意取去。但是對於“去其聲病”而“感天地，泣鬼神”的詩辭卻是格外鍾愛的，認為與文相比，“猶繪事組繡有精拙耳”。鑒於這種認識，他花費了很多心血在松陵唱和的組織、運作和《松陵集》的編纂上。從皮日休《魯望示廣文先生吳門二章，情格高散，可醒俗態。因追想山中風度，次韻屬和，存